

# 理论学习参考

〔2014〕第13期 总第52期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编印

2014年5月25日

---

## 【编者按】

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大力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外文出版社推出了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编写的《中共十八大：中国梦与世界》权威学习读物。这是一本对十八大精神和中国梦进行通俗解读的理论读物，是理论面对面的国际版。该书既是对中共十八大精神的精要解读，同时也是对中国梦主题的一种深刻阐释。该书尝试从回答国际社会和国内读者关切的问题入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大量事例、详实具体的数字和通俗平实鲜活的语言，对中共执政理念、中国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进行系统介绍。该书以十二章六十余个问题，详细论述和回答了“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向何处去”及“十八大之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向何处去”等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现将该书（电子版节选）汇编成集，供大家学习参考。

# 中共十八大：中国梦与世界

## 序言

### 中共十八大与中国梦

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十八大政治报告

#### 一

2012年11月29日，就在中共十八大闭幕后的第21天，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即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在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后，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中国梦，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议，许多人在探寻中国梦提出背后的政治含义及内外影响。也有人纳闷，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和习惯做法，十八大闭幕之后，通常都会把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怎么会在十八大刚一结束就提出中国梦这一并未见诸十八大报告的新概念呢？

其实，细想起来，中国梦的提出看似意料之外，实属情理之中。“中国梦”这个词虽未见诸十八大报告，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的同义语在报告中出现了不下八次，报告开篇即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结语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报告更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梦想。那么，中华民族怎么才能算复兴呢？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了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不过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形象概括和通俗说法。如果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的话，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则是十八大报告的灵魂，整个十八大报告就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国梦展开的。也可以这么讲，中国梦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冲锋号和宣言书，十八大报告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图。

因此，要理解中国梦，必先理解中共十八大的实质精神和深刻内涵，与其琢磨中国梦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倒不如思考一下十八大发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息。这样可能收获更大，也更能抓住中国梦带来的机遇。

## 二

中国梦提出后，国际社会出现不同看法和声音，理解和认同者有之，不解和误解者亦有之，还有人甚至把中国梦同追求霸权、建立“中国治下的和平”等联系起来。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在2013年3月17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梦的具体内涵。他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中国梦是国家发展梦，不是霸权梦。近代以来，中国曾经积贫积弱，所以中国人普遍希望这个国家有朝一日能既富又强。这里的富，既包括物质上的富，也包括精神上的富，因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里的强不仅指经济科技的强，而且指文化、教育、体育、国防、生态等各方面都强。也就是说，国家富强的真正含义是实现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与所谓的霸权风牛马不相及。目前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远没有实现富和强，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实际上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总布局，按照这个总布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关键。

中国梦是民族尊严梦，不是帝国梦。中国人对近代中华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而逐渐沉沦、丧权辱国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总盼着有民族振兴、民族复兴那一天。但民族振兴也好，民族复兴也罢，无非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更有尊严一些，不是“梦回唐朝”，也不是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对中国而言，要有尊严，最重要的，一是要自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敢有丝毫懈怠，否则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也不会有那么多国家高看中国一眼。二是要自信。人连自己都不信，何来自强？但自信要底气，不可夜郎自大。十八大之所以提出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盖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中国自强的根本原因所在。但中国人奉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哲学，国际社会也不必担心中国会因自信而对外输出自己的道路、理论和制度。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梦，不是宪政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在中共看来，人民幸福不仅体现在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

的环境上，也不仅体现在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及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上。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民当家作主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幸福。所以，十八大报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个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而以西方基本政治制度诸如“三权分立”、多党制等为指向的所谓“宪政梦”是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和持久幸福的，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 三

国际社会普遍关心中国如何实现中国梦，特别想知道实现中国梦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对此，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今年6月7日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非正式会晤时，习近平进一步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阐述中国梦的实现之道，强调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新形势下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人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经历过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百年苦难的中国，不会以非和平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人以史为鉴，目睹过一些国家因称霸或衰或亡的中国，不可能选择重蹈历史覆辙；中国人更看重实效，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路，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这条路，对内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外叫和平发展道路，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其要义就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自主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搞军备竞赛，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

新形势下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且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中国梦的实现首先是中国人的事情，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就形成不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圆梦的局面。实现中国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没有改革创新

的精神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能否实现中国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看自己做得怎么样，特别是看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实现中国梦的态度是相信还是怀疑、理解还是猜忌、支持还是阻挠。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本质上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给世界带来的将是和平、发展、合作，是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而决不是什么威胁。但这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至少是包容。如果一些国家或一些人总抱着意识形态教条或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那一套不合时宜的东西不放，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或看不得别人吃饺子，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宁可言，别说中国梦，什么梦也实现不了。

新形势下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凝聚中国力量，而且要凝聚支持、理解和同情中国的世界力量。中国力量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也在党。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些党的命运起伏或因腐败，或因不团结，或因思想混乱，但都提出了一个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中共也不例外。十八大所以提出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其根本目的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世界力量的关键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指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就像当年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不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样，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梦也会是水中月、镜中花。所以，十八大报告重申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并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作为中国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方针。

以上只是就中共十八大与中国梦的关系做了一点粗浅的阐述，既不深，也不透。我们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梦的方方面面，还是要深入到报告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中去，届时您会对中国围绕实现中国梦提出的内外政策有一些新的判断，对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共产党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您会发现中国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不仅不会为实现中国梦损害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梦做出不懈的努力。

## 第一编 十八大后的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十八大政治报告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断地被提起，国际社会也不时有“中共将成为下一个苏共”的议论、猜测和预言，言外之意是说，中共是苏共的模子刻出来的，既然苏共的“冬天”已经来临，中共的“春天”还会继续下去吗？其实，稍微对历史有点了解和不带偏见的人都清楚，苏共曾是中共学习的榜样不假，但今日的中共和昔日的苏共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不断推进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既坚持原则、永葆本色，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现代化政党。这可以从中共的发展历史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中共十八大报告所宣示的政策主张中看出来。革命时期，虽然如毛泽东所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但中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虽然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甚至憧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中共也没有唯苏联模式是从。1956年前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逐步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中共早已不是过去的苏共，甚至也不是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共的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也标志着中共正更加自信和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尽管不同的人对共产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社会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来没有改变过。翻开新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信仰成就了新中国的建国大

业。中共建立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正是这种力量的支撑，使中共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败形形色色的敌人，建立起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在总结党的曲折而辉煌的历史进程时曾经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中国就不会结束四分五裂的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又反复强调，“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则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一回事，把理想信念变成现实是另一回事。正如高楼大厦总要一砖一瓦地盖一样，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社会建立也要一步一步地进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口吃成个胖子。苏共曾领导苏联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中共也曾带领中国人民搞“大跃进”，结果都造成了很大问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当作现实了。由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建设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苏共和中共都犯过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严重错误，幸运的是，中共能够正视和纠正这一错误，最终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要通往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须经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中国，我们把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就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成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为系统和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被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理论和制度。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由一个在古

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的东方大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曾尝试过君主立宪、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资本主义制度，但都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一度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沿着改旗易帜、全盘西化的方向走，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不仅避免了重蹈苏联东欧政党瓦解、国家分裂的覆辙，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一段历史表明，无论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进步的根本方向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共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成就。但与此同时，许多问题也出来了，如贪污腐败、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社会道德水准滑坡等。对此，国内外的认识和看法并不一致。一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因中国搞市场经济造成的，都是金钱惹的祸。解决的办法就是少些市场经济，多些社会主义，少些放任自流，多些政府管制。有人甚至主张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还有一种则认为，这些问题是因市场经济发挥的作用不够带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干预”过多导致的，解决的办法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取消或至少弱化中共的领导作用。有人干脆建议把共产党的名字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把党的指导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成“民主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并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发展，允许剥削现象存在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经济社会政策还有什么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政策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策，除了一字之差究竟还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两种观点，中共十八大报告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将“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实行市场经济也已超过二十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取得的成效显著，有目共睹，退回去把自己封闭起来，关

起门来朝天过，或者转而采取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不可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那样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走，走也是死路一条。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舍此别无他途。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要看好方向，方向错了，走得越快离初衷越远。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初是不愿触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又采取激进手段，一夜之间改为市场经济，并主动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改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后把偌大个苏联都改没了，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共绝不能学苏共自毁长城，尤其不能把党的旗帜稀里糊涂地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会把中国引向邪路，到头来还是没有好果子吃。

为什么这么讲呢？总结中东欧国家剧变的教训，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国家的剧变都是从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开始的，都是从指导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化开始的。从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演变为社会党，到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建为社会党，中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除罗马尼亚共产党不复存在外相继嬗变为社会民主党。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分为二——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联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在国家解体之前便一分为五，各共和国的共盟纷纷改名，演变为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共产党所信奉的传统社会主义与社会党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同源的，政策上是相似的，转变起来相对容易，也比较有迷惑性。

一般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共同起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兴起于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后来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很长时间里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词。19世纪末，随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分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则成为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分水岭。此后，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左翼自称为共产党，联合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原社会民主主义中的右翼和中派，则在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逐渐合流，彻底走向了社会改良主义，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他们仍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区别于当时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到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为了与俄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相区别，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表明自己的“民主主义”性质。

同样起源于欧洲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指引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后来，斯大林打着

列宁主义的旗号提出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由此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再后来，这一模式由苏联推广到东欧各国，也推广到了中国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共产国际、苏联、苏共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也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从整体上看，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基本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进行了强化。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当苏联、东欧国家尝试对这一模式进行局部改革时，中国则反对任何类似改革，将其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已经发展成为“极端版本”的斯大林模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率先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藩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在苏东剧变后，着眼于从根本上突破或否定斯大林模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但不走老路不等于要走到别的路上去，同源也不等于一定要同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否定，是要闯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新路，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更不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可。中国搞改革是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共也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虽然同属世界左翼进步力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比如，在指导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而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在思想理论来源上多元化，还特别强调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在所有制形式上，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支持和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并始终坚持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立场。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以私有制为讨论问题的前提的，并完全放弃了在制度上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要求。最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多党制，主张所谓彻底的民主制。如果放弃

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所主张的那些理念和政策便无法得到保证，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当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不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好的东西，比如其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就值得借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都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营养。中国共产党也无意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每个国家都是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大地，适合中国的国情，若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民主社会主义未必不适合其他国家，在中国是邪路，在别处可能是正路。毕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制度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选拔任用干部的？

很多人都惊叹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其实，中国共产党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除了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外，就在于能吸引、培养和使用一大批优秀的干部。这些干部是中共执政骨干中的中坚力量，是中共完成执政使命的关键和依靠。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团结人民开展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争，因条件比较艰苦，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主要采取委任制、民主推举与选举相结合，以委任制为主的办法。建国后，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用的是战争年代高度集中的干部体制和选拔制度，但在选拔方式上也探索出把选拔和下放锻炼结合起来、把选拔与退居二线结合起来、把选拔与培训结合起来、把选拔与交流结合起来的有益形式和做法，并形成制度。196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制度动议。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步突破了单一的管理体制和任用方法，形成了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考任制等几种方式并存的局面。选任制是由选民普遍选举产生或由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党政领导干部的制度；委任制是由上级领导干部任命下级领导干部的制度；聘用制是通过签订合同来选用干部的制度；考任制是通过公开竞争考察后择优录用的制度。

中共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的是“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的是三条，一是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二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坚持注

重实绩，群众公认。无论强调的侧重点有多不同，最基本的是两点：德与才，而且以德为先，这和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选人用人传统和标准是一致的。中国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孟子曾经说过：“夫尚贤者，政之本也”，“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在“广纳贤才、求贤若渴”和强调“唯才是举”的同时，更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的具备与缺失决定着一个人对人对事对国家是否忠诚，有才无德的人关键时候可能站不稳立场，甚至走向反面，破坏性更大。对中共干部来说，“德”首要的是对党、对人民忠诚。新形势下一些很有能力的人犯了大错，主要是德行出了问题。比如中国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其任职期间，中国铁路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他本人却因犯有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被依法处理。

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共缺乏民主的根据之一，是中国的干部由上级组织和领导确定，没有经过群众投票选举，群众没有投票选择自己的干部的权利。这种看法是缺乏依据的。前面提到，中共选拔干部的方式有多种，包括通过选举产生。其实，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无论哪种方式，关键是把真正优秀的人选到重要岗位上去。一种体制，如果最终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举到最关键的位置，如果让党派利益捆住领导人手脚而无法有所作为，这种体制显然就有问题。经过长期探索，中共形成了富有成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努力做到选贤任能，使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而且中共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不同选拔任用不同的干部的，既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形式，也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标准。中共这种既“选”（投票）又“举”（举荐）的选拔（selection）而非纯选举（election）的制度，延续了几千年来“选贤任能”的传统，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党情。加拿大学者贝淡宁教授对这种制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其优点一目了然。干部晋升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只有那些表现卓越者才能晋升到高层。官员可以专心致力于增进知识和业绩，而无需为争夺选票荒废时间和金钱”。

应当承认，选贤任能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和制度并非完美或没有漏洞。相比较而言，德的判断标准往往主观性比较大，如何减少选拔的随意性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中共也借鉴了西方国家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广大干部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要扩大提名环节的民主，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方法，科学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结果，把尊重民意和不简单以票取人统一起来。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二是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

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把真正优秀的干部选拔出来，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继续把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2008年以来。全国竞争性选拔干部达 32.8 万人。2011 年，省区市竞争性选拔厅处级干部占新提拔总数的 30.7%，中央和国家机关则达到了 46%。三是健全干部管理体制，从严管理和监督干部。加强党政正职、关键岗位干部培养选拔，重点培养、重点选配、重点管理、重点监督，着力培养造就一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继续探索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办法，构建干部能下能出机制。为了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自 2008 年开始，中央组织部和全国 31 个省区市同步开通了“12380”专用举报电话，方便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纠正和查处了一批干部任用中的违纪违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重视发挥制度的作用。截至目前，中共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制度规定有近 30 项之多，其中包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 25 人组成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和交接制度是每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封建王朝采用的是世袭制，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是普选制。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领导人更替和交接制度呢？因为列宁去世早，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斯大林上台后，大搞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没人敢触及这个问题，致使苏共始终没有形成一套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最高领导更新机制。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苏共政治生活已经被称为“老人政治”。1982 年 11 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继任；15 个月后，安德罗波夫逝世，契尔年科继任；短短一年之后，1985 年 3 月，契尔年科逝世。

苏共的高层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严重阻碍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其后果就是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和领导素质呈现出明显的递减之势，造成庸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局面。终身制也使苏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

挑选、培养、锻炼和考验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使得那些在党内缺乏足够威信、理论修养较差、领导水平不高，甚至怀有不正当目的的人通过投机、钻营，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党的各级领导大权。这些人往往在面临重大转折关头或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时，意志软弱不坚定，无能、无力、无方，甚至加速和加重危机的爆发和到来。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针对苏共及当时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虽然中国此前从未明文规定过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实际情况是干部的任职一般不受年龄、健康、任期的限制。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他还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退休制度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这项制度对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干部的年龄界限作出了规定。同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几项决定》的通知。随后，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届数作出了均不得超过两届的明确规定。从中共十二大开始，党章做出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个规定也适合于党的领袖，但党章本身并没有明文规定领袖任职的具体届数。尽管如此，从邓小平同志开始，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际上被废除。在中共十六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除胡锦涛外，全部退出中国最高领导层，以实际行动开创了党的领导人任职两届的先例，不仅在事实上确立了领导人“到年龄退休制”，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标志着中共领导人的更替制度又向前进了一步。

应当说，中国的领导人更替制度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一个制度要想运转良好，不仅要具有灵活性，还要具有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的改变。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其中“一党领导、全

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制度的借鉴。这种模式综合了东西方制度的优点，避免了其缺点。

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并能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最有能力、最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避免西方民主制度的“只会选举、不会治国”的政治平庸化，年龄限制和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避免政治强人和恋权恋栈的出现。

中共领导人和领导机构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每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每届中央委员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在下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继续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直到下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央领导人为止。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发展党内民主的？

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民主”。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共十八大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党内民主是党内利益协调、避免体制内冲突的重要形式，是一个政党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之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能否长久执政，能否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党内部民主的发展水平。在中共看来，新形势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建立和健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选举制度、党内事务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等，这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的根本途径。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发扬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为党的事业建言献策，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命题后，2009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及中共领导人反复强调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气氛、民

主监督的制度环境，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而最能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无疑是党员在党内的有效竞争。

浙江省台州市是中国一个东部沿海城市。2011年12月21日下午，面对台州市路桥街道古街社区、新安社区、商城社区组成的第三选区的364名党员，路桥区委书记郑敏强用精炼的语言向党员作了如何为群众服务的介绍，并当面回答党员提问。为准备这次竞选，他提前几周就来到选区，走访了解党员群众的意见和愿望。老党员管梅芳在投完票后说：“区委书记和普通党员一起竞争演说，当面做出承诺表态，让我们信服。”在路桥，从区委书记、区长到一线党员，所有参选党员无论身份职务，都以普通党员身份报名参选，平等接受选举党委委员的遴选。自2004年底开始，台州市路桥区在区镇两级全面推行党代表直选工作，把差额竞争机制引入区党代表公推直选全过程，并在直选大会上专门设置“候选人差额PK”环节。据统计，台州市路桥区此次党代表选举共有674名党员报名参选，最终确定的党代表候选人正式人选373名，差额比例达到了45.1%。其中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下降了，经济、文化、科技、农村等一线代表比例有所增加。从直选结果看，部分上届党代表因5年任期内无所作为或履职不力，有些被竞争对手淘汰，有的甚至没有获得党支部的民主推荐提名；而部分党代表因在任期内较好地发挥了提案、提议、质询、询问、联系党员和群众等作用则再次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和肯定。这种直选既活跃了党内民主气氛，又激发了党员的参与热情，更增强了党代表的责任意识，大部分选区的党员到会参选率高达97%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努力和探索。近年来，中共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还做了其他一些有意义的尝试。

一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迈出新步伐。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和重要制度保证。

切实增强代表的广泛性和先进性。提高基层一线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代表比例。中共十八大代表选举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占30.5%，比十七大时提高了2.1个百分点；工人代表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工人党员由十七大时的51名增加到169名（包括农民工党员26名），占7.4%。

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长期以来，党代表的作用只体现在开会的几天时间。实行任期制后，使党代表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调查研究、参与决策、民主评议、开展监督的作用从“一次性”变为“经常性”。中共十六大提出“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中共十七大作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决定，并写入党章。2008年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对全国地方各级党代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开展工作的方式、履行职责的保障及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等作出规定。目前，全

国共有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实施办法。中共十八大提出要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

继续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指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中共八大曾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邓小平曾指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难以达到的。”目前全国有 300 多个县、近 3000 个乡镇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点地方普遍建立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强化年会职责。十八大报告提出，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这是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其重要意义在于，党代会有很重要的决策功能，如果这个决策没有基层意见，没有党员和老百姓的意见，就容易发生偏差。今后党代会代表对党的大政方针都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二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

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许多地方探索个人自荐、组织推荐、党员群众联名推荐、领导干部署名推荐等多种方式产生候选人，充分体现了广大党员的意愿。

改进候选人介绍办法。在乡（镇）、村换届中，一些地方采取竞职演讲、回答党员群众提问、实地调研、召开座谈见面会、公布工作实绩等方式介绍候选人，克服了投票时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一些地方还利用多媒体进行全面展示，将候选人的情况拍摄成短片，生动直观地介绍候选人情况。

提高候选人差额比例。十八大地方党委换届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委员候选人差额比例平均为 11.9%，比上次换届提高 0.6 个百分点。

三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取得新进步。

大力推进基层党务公开。目前，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党务公开覆盖面达到 80% 以上，特别是党务公开的形式进一步丰富，如建立“网上党务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举行党员群众听证会等，有效地推动了各级党组织转变工作作风，增强了党员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开推荐范围。各地区在部分基层党组织中采取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目前全国共有 18.6 万个基层党组织开展试点，其中有 565 个乡镇（镇）在十八大党委换届中开展试点。

积极推进基层民主议事决策。一些地方探索民主恳谈会、民主议政日、党员议事日等做法。各地区还实行党内事务听证质询、民主议事决策等制度，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和程序。

拓展党内基层民主监督渠道。许多地方开展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接受党员或党代会代表的民主评议。不少市（县）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开放党务会议，邀请党员和群众代表列席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和基层党组织有关会议等。各地区在发展党员、党内表彰等工作中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进行公示，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当然，以上这些做法还在试行或探索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随着党内民主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党内民主实践的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建设将逐步进入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并结出一个又一个硕果。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如何实现的？

无论是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还是强调党的纪律建设，根本目的还是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能更有效地领导人民治理国家。许多外国朋友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执政党和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事必躬亲。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共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治领导就是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思想领导就是通过舆论宣传教育等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主动、自觉地实现党的主张和国家政策法律；组织领导就是在各级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并发挥其领导核心和居中协调作用，保证党的主张和国家政策法律的贯彻落实。这里重点从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两个视角看一看中共是如何领导国家的。

作为执政党，中共第一位的任务是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也就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站在全局角度并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明确一定历史阶段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如中国共产党在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并于次年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为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在这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是一个法定程序，起着将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的桥梁作用。如通过不了，党的主张就只是党的主张，只对全党有效，对非党员就无效。所以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目前，中央、省、市、县都有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法定的程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政策，然后由政府执行。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政府的执政纲领，事先都经过党的酝酿、讨论和批准。以中国五年规划的产生为例：先是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五年规划的建议；然后由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编制规划纲要；接着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规划纲要和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并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成为国家发展纲要。

负责贯彻落实党的政策主张的是党的各级组织，通称“党组”。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党的组织。其职责主要有：一是负责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贯彻执行中央和批准其成立的党的委员会决议和决定的措施。二是对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三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负责干部的推荐、提名、任免和管理。四是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五是领导本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六是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可见，党组主要通过价值引领、组织动员、支持服务、统筹协调、凝聚骨干等渠道，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各部门、各地区、各群体、各行业。目前，国务院党组书记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有些部门是民主党派成员担任行政方面的“一把手”，党组书记则由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背景的副部长担任。由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各级政府、各个国家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从而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前进。

当然，在发挥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由于经历、教育背景、角度甚至利益考量等不同，中间也会产生分歧和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前文提到的民主集中制。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凭什么保持先进？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90多年来最大的转变既包括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包括从革命式执政到建设式执政的转变。前者是地位和定位的转变，后者是执政方式的转变。中共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说明，中共虽在执政，但脑子里还是革命的思想，总想着要打倒谁。“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也表明那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还是政治运动式的，热闹是热闹了，激情也够激情，但没有多少可持续性，因为这不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才逐渐明白原来革命和执政是两回事，明白了建设一个新世界一点也不比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明白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实在太多。于是，一方面，中共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这个执政的核心问题上，另一方面探索执政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在三个方面下了功夫：一是注意党的代表性。二

是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就是程序问题。三是加强学习、提高能力。

先说党的代表性。这在前面也简单提到过，主要是扩大并巩固党的社会基础。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越广泛、越巩固，执政合法性的认同面就越宽广，执政地位就越巩固。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利益也出现了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原来意义的工人阶级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工人不再是“无产者”，在一些企业，工人也不再是单纯的受雇者，由于实行股份制或参与股票市场而成了股东；在发展较快的农村，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过去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现代化企业中的工人；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大批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如知识分子）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的工人队伍逐渐缩小，白领工人、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干部、教师和自由职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数量也由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量增长。中共提出了“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最广大”一词，说明在代表人民利益时要增强广泛性，既要关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也要兼顾其他劳动者、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者的利益。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扩大，有利于中共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整合作用。

再说程序。程序民主是现代民主的重要方面。要想代表人家，首先必须保证代表人家做出的决策或事情是正确的，否则人家就不愿意被代表。这就要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一定保证决策是正确的，但正确率至少比不科学不民主的决策正确率要高。中共以前吃过这方面的亏，所以现在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世情、国情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依照法定程序决定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民主决策、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过程。中央层面的一个完整的党内决策过程通常是这样的：

——先是进行调查研究，向各地政府、研究机构和社会了解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研究课题，请各个相关研究机构进行专题研究，提出研究报告。

——成立中央文件起草组，在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就某些专题到地方调查研究，然后提出文件起草提纲，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

——文件起草组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召开各种座谈会，修改提纲。

——中央就文件制定中涉及到的几个大问题，由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常委、部分委员以及相关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意见提供给中共中央参考。

——将文件的初稿送给中央委员、党代表和省部级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同时由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座谈，听取意见。

——根据各个方面提出的意见进行文件修改，然后提请中共中央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最后召开中共中央全委会，将修改后的文件（送审稿）提交给中央委员审议、表决。

最后说能力。中共对提高执政能力非常重视。有心无力，就可能好心办坏事。1949年，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京时曾形容这是“进京赶考”，实际上是对能否执好政充满忐忑之情，因此他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01年5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同时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立场观点的问题要解决好，工作能力的问题也要解决好。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各级干部的工作能力问题作了全面部署。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没有能力，先进性从何而来？但能力又从哪里来呢？只能从不断学习中来。所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中共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政党。其实这三者之中，学习是最根本的，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思路的提出最终还是要靠学习。习近平在庆祝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

为搞好学习，从2002年开始，中央政治局建立了集体学习制度，并坚持至今。10年来，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已经开展集体学习近80次，有146名专家学者讲课。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也已经开展了五次学习。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带动下，各地各部门也纷纷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学习活动。专题研讨、集体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论坛……形式多种多样，全员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在全党蔚然成风。国家发展改革委创办的青年读书论坛定期用问卷、手机短信等方式了解青年需求，让青年干部成为论坛的真正主人，每期的嘉宾、选题、推荐书目都要经过精挑细选，拓展了年轻人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才干。陕西省委中心组先后就用好金融和资本市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主题进行了20多次专题学习；中

组部不但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还重视基层党员队伍的培训，并举办了一系列示范培训班。来自基层一线的 256 名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分两批到北京参加了由中组部直接举办的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示范班。此外，中组部还陆续举办了 4 期新任乡镇书记培训示范班、9 期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等，并联合中央有关部委举办了 5 批、16 期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在全国引起了热烈反响。据统计，5 年来，全国共培训党员 17476 万人次，其中农村党组织书记培训 456 万人次、新党员培训 1383 万人次、大学生村官党员培训 122 万人次、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 4481 万人次。学习培训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各种形式的网上课堂、远程教育纷纷建立起来。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能遏制腐败吗？

中共十八大提出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这个命题和任务后，国际上有人演绎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因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变得不纯了，并不无担心地说，这样下去，中共早晚要步苏共的后尘，因为苏共在后期也是腐败现象严重。不可否认，苏联解体与苏共的腐败有一定的联系，但中共的情况与苏共不一样，不但腐败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而且对待腐败的态度更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真实的数据来说明问题：

第一组数据：2007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构共立案 64 万多件，结案 63 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6 万多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4 万多人。也就是说，在近 5 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有 13.2 万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平均每年有 4800 名党员违法犯罪并受到党纪国法处罚。

第二组数据：截止 2007 年和 2012 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分别为 7415.3 万名和 8512 万名。即使以 2007 年 7415.3 万党员人数为基点，每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13.2 万党员，仅占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七八；每年 4800 名违法犯罪的党员，仅占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的十万分之六点四七。

通过数据比较，可以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 8512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违纪违法的党员，纯洁性褪色和丧失纯洁性的党员，只是极少数，党的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纯洁性，才保证了先进性和战斗力。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引领 13 亿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不可能使 13 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善。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文过饰非。事实上，对于党内的腐败，中共是有着

清醒的认识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始终保持政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见面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此后，他多次谈到反腐败问题。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更是强调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中共在反腐方面不仅决心大，而且形成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反腐思路，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一是教育。思想是先于行动的，先有腐败的想法，再有腐败的做法。所有腐败都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共的建党思想原则是思想建党，强调思想上的忠诚和一致。所以在反腐败问题上首先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中共十八大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着眼点是提醒党员干部要心中想着群众、想着人民，而不是自己的特权。

二是公开。许多腐败源于暗箱操作、源于不公开不透明。近年来，中共大力推动权力公开，从政务信息公开到党务信息公开，到“三公消费公开”再到“施政行为公开”。十八大提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目前，中共也在抓紧研究制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三是预防和惩治相结合。中国专门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把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不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四是监督。中共欢迎来自其他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年来，网络反腐声势大、呼声高，效果也不错，就是很好的例子。

五是制度。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人治的色彩较重。习近平强调，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形成一定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除了有关规定外，中共也在考虑起草一部国家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

六是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苍蝇。既要严肃查处薄熙来、刘志军等一批高级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大案要案，也要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以其小而忽视。其实腐败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如不对一些小的腐败问题进行查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大患。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一道制定了从自身做起，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有人说，这是新时期中共“从严治党”的庄严承诺。路透社中文网首页头条文章认为，中国新领导人呼应民心所向，用平白务实的表态传递出打造清廉高效政府的决心。华尔街日报刊发长篇文章，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寻求改变中共形象”。华盛顿邮报报道认为，中共高层出台这些规定“值得鼓舞”，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亲民为民的执政决心。还有媒体称，八项规定“从小处细节着手整顿党风，可谓四两拨千斤，一扫旧尘埃，开辟新气象”。这些报道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共从严治党的关切与肯定，也表明中共在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当然，腐败是世界性治理难题，对于世界上任何执政党而言，反腐败工作都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如何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各国采取的措施不一，治理效果各异。中共自信能遏制住腐败的蔓延，但要彻底消除腐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也愿就这个问题与世界各国各党进行交流。

## 第二编 十八大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十八大政治报告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为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设定阶段性目标，是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快速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和通常做法，这可以让人们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知道今天明天该做些什么，而不只是憧憬和畅想。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翻两番”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从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且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可以说目标、任务、措施、路径都有了。如果问十八大后中国会向何处去，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继续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 第五章 中国经济还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吗？

客观地讲，中国 30 多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也不会无限期无条件地简单延续。无论是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还是中国经济“30 年河东、30 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迎来了新的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首先，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对外开放带来了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现在已开始衰减了。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了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从当年 10% 以下上升到 2006 年的 65% 以上，远超美国，今后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成为对外经济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格局的改变已经不可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总之，对外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剑”。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今后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恐怕变得越来越难了。目前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接下来要对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的领域进行改革，但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已不只是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的问题，弄不好会增加社会大众的分歧，甚或降低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同样困难和敏感。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

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端屡见不鲜，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必须深入系统思考的重大课题。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阻力。一方面，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现出来，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 1.5 亿农民工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这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了畸形的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的相互博弈，迅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了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 GDP 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并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最后，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在所难免。但这种转变本身，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带来增长的制约。

因此，如何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中国经济未来 10 年能否延续 21 世纪头 10 年的高速增长？未来的 10 年会不会进入一个低速的或者说中低速的增长时期？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判断，或许是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以及其他一切重大战略部署的基础。我们的看法是，尽管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出现了一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困境”，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丧失动力，必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

第一，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赶超型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今未超过 5000 美元，按购买力评价也不过是 7000 美元左右。这样的发展水平，在科技发展、商业模式、管理方式方面总体上仍然处于赶超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理念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在这个阶段，

中国的发展是不受科技发展前沿推进缓慢、理念创新达到极限等限制的。赶超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差距就是潜力。

第二，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具有 13 亿人口和广阔的市场，如此巨大的大国经济，其根本优势就是潜在的国内市场。这个潜在市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地区差异。中国内部既有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00 美元的大城市，更有不少人均值还不到 1000 美元的广大农村。由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是处在同一个社会管理体制下，这种差距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第三，中国具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资本积累优势。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消费率上涨而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的趋势，导致资本积累速度和规模不断降低，使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根基。中国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资本积累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尽管过度依靠投资拉动增长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适度增长，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要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中国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驱动力量。

第四，中国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成为推动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很大的推进空间。特别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市场，仍然存在过度规制和较严重的扭曲，价格体系还无法反映要素的真实稀缺程度。未来要素市场的改革深化将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和市场机制的“回归”，引导和诱致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中国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一方面，中国的“家底儿”更厚实了，不但拥有了更加雄厚的外汇储备，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而且拥有了更加国际化的一流人才队伍，今后可做能做的事情更多了，底气更足了；另一方面，在经历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考验”之后，中国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发展经验更丰富了。这些都是千金不换的宝贵财富，必将内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总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存在，投资中国仍等同于投资未来。如果对此丧失信心，就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 第五章 中国将如何打造经济升级版？

在对形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这体现了发展、改革、转变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首先，发展必须转变。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较大，粗放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转变方式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次，转变必须改革。体制机制不合理是制约转变方式的最大障碍，转方式必须深化改革，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改革。第三，改革未有穷期。中国已经进入转方式的关键期、发展的转型期和改革的深水区。在这个阶段上，改革的诉求与期待增多，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加大，但改革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需要把抓改革、促转变、谋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2013年3月17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前述目标和任务的总要求和形象说法。而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一是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30多年高速发展的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追求的发展，是速度、质量、效益统一的发展，不是一味求快，而是从又快又好切实转到又好又快上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应体现在企业利润的增加上，也应体现在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上。现阶段要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目前，中国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二是内需与外需的关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靠的是内需，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放缓的形势下，中国仍要靠扩大内需实现持续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也是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中国积极扩大内需，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调整与发展。

三是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着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投资与消费失衡，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难题。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需求不足。近些年来，中国消费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消费率总体呈下降态势，而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消费率长期偏低，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将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在增强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等方面构建长效机制。同时也要看到，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直接而有效，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也需

要合理的投资作支撑。下一步中国将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更多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实现增投资、扩消费、惠民生的一举多得。

四是创新与模仿的关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水平较低，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多处于模仿阶段，自主知识产权不多，也存在一些侵犯国外知识产权的情况。中国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一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共十八大更是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出了“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等要求。

五是虚拟与实体的关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虚拟经济，特别是现代金融业的健康适度发展，有利于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及时的金融支持与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促进各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为市场主体之间必要的分化重组提供了更多选择。但虚拟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逐利冲动，这会导致其规模过度膨胀，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还会掩盖经济过热的实际情况，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诫我们，虚拟经济不能不发展，但也不能过度发展，没有实体经济做基础和后盾的虚拟经济发展最终会成为一场噩梦。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既是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相关教训的汲取。

六是公有与私有的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姓“社”还是姓“资”，到姓“公”还是姓“私”，所有制问题曾经是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困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的回答是，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在现实中这两者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存在人们议论的“国进民退”现象呢？这里有三句话要强调：第一，两者的政治地位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是自然的。但主导并不等于所占比例高。事实上，从2003年到201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国企业的比重，户数由17.47%下降到5.24%，资产由55.99%下降到41.68%，主营业务收入由40.53%下降到27.19%。第二，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歧视的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第三，中国既不需要传统的“国进民退”，也不需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退民进”，而是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和遵循市场规则基础上的“国民共进”。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也要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好环境和条件，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厚此薄彼。

七是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产生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进城的农民工由于身份、待遇等问题融入不了所在的城市，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而输出农民工的农村则因缺乏劳动力和土地分散发展不起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人的城镇化”，重点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让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镇同步。为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重大措施，一个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格局可望在不远的将来形成。

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在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事实表明，要发展经济，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干预过度。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过分迷信市场的功效。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积极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其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也存在着自发性事后调节、催生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等固有的功能缺陷，而且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因此，完全摒弃政府管理和调控的市场经济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使政府行为在调节经济、弥补市场功能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错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 第六章 中国为何不搞“多党制”？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个国家实际掌握政权的政党数目为标准，可以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政党制度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其形成受一国的国体、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国家内部各个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的影响，也受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只要符合一国国情、民族性格、社会历史条件，且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幸福和生产力提高，就是好的、有效的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包含三点要义：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多党合作，三是政治协商。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适合中国国情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有外国朋友问，其他政党为什么要接受中共的领导？将来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实行西方的多党制？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这一制度形成的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受巨大摧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曾两度出现“多党政治”的局势。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开始竞相效仿组织政党，“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政党林立、多党竞争的格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导人也曾效仿西方推进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之后，孙中山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式，意识到单靠国民党自身力量无力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于是提出“新三民主义”，并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第一次国内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至此开始了国民党长达22年的一党专政统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多党政治”的局势再度到来。双方谈了40天，最后国民党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的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太阳。”中国共产党无奈，毛泽东只得回答：“那就由中国老百姓最后决定，留下一个、去掉一个。”结果中国的老百姓把中国共产党留下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端于抗战时期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抗战后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得

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拥护。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懈努力，但遭到国民党拒绝。国民党继续实行独裁政策导致民主党派彻底放弃“中间路线”，形成了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格局。1949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共同纲领，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

经过60多年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中国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它保持了中国政治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一制度一方面确保了坚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通过为公民提供合法的、畅通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渠道，将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中，逐步健全和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其次，它实现了社会整合。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思想多元化，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这个世界上超大规模社会的整合，对共产党和全世界都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强大的组织网络体系、社会资源配置能力和意识形态领导力，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共同致力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整合、利益协调和政治认同。最后，它促进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了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具体利益和现实要求，一方面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能够汇集不同阶层的要求和意见，对党和政府工作形成民主监督，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应该看到，两党制或者多党制虽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自身并不意味着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两党制、多党制的政党体制所体现出的分利集团特点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越发明显，一方面各大政党都从其利益出发来制定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日趋分化和多元，各大政党基于赢取选民支持的需要，其政策的趋同性和模糊性越发明显，政策的持续性更加难以实现，金钱政治的色彩也更加浓厚。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的制度性困境就在这里。再者，不顾本国国情盲目植入西方政治制度极易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战后一些非洲国家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实行多党制所造成的政局动荡，以及21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移植他国政党制度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社会不稳就是明证。也许有人要说，一百多年前，多党制在中国有过实践，行不通，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今天仍然行不通；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制在中国有过希望，破灭了，

但那也不意味着今天仍然行不通。对此，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曾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从实践上看，现行的政党制度已经保证中国实现了连续30年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是已知数；换个政党制度是未知数。当然，这个已知数里肯定有些问题，但是这个已知数总体上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已知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感觉还不错，为什么还要找未知数来代替呢？”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促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 第六章 中国为何不实行“三权分立”？

“中国式民主”在政党制度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方面表现为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而非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

中国为什么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模式呢？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曾经有过多种政治制度形式的选择。1895年甲午战争后，满清王朝陷入深重危机，清政府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试图通过变法维新，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因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反对而流产，清政府错失了改革时机。辛亥革命前夕，慈禧太后欲推行君主立宪制而革命党人则立志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先后实行所谓军政和训政，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的军事首领蒋介石先后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实行独裁专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给发动内战争取时间和欺骗人民，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所谓“宪法”。但是，即使这样的“宪法”，也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实施。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大会和宪法被蒋介石束之高阁，资产阶级共和制在中国也破了产。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回答和解决这个历史课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借鉴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建立新型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创造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建立各阶级阶层人士参加的参议会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深刻总结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其次，“三权分立”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传统。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文化角度讲就是，中国人比较突出集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强调合作统一而不是竞争分立。这是中国为什么不搞多党制的深层原因，也是不搞“三权分立”的深层原因。“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不同机构所有，彼此互不统属，相互牵制和约束以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其设计依据的是“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因而需要实现权力分立和制衡（简称分权制衡）的政治学理论。总统制国家较为彻底地实行了三权分立，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是最为彻底的。议会制国家中的行政机关首脑来自议会中的多数派，因而也掌握着立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并未完全分离。但在这两类国家中，司法权都对立法权和行政权保持着独立性，发挥着制约作用。三权分立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关之间在权力分立和制约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和摩擦，降低行政效率，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政府运转“停摆”。美国发生的“财政悬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老百姓绝对看不惯，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统一权威的丧失，一种安定生活环境的丧失。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制结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仅拥有立法权，还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拥有监督权，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由它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一方面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言，通过“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以“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在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等国家机关设立受各级党委领导的党组、机关党委、选派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等多种方式，从政权组织内外实现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效领导和顺利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法院、检察院之间并非一种相互独立、彼此制约的关系，而是一种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系。而且，中国文化崇尚言必行、行必果，言行一致，老百姓希望好的政策马上能实行，而不是在那里吵来吵去，议而不决。显然，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符合中国人民议而决、决而行、行必果的要求。

第三，中国虽然不搞“三权分立”，但也高度重视权力制约问题。中国君主专制主义统治时期，儒家曾设想并尝试过由官僚士大夫阶层通过规劝、谏诤等方式来柔性约束君权，并为此设立了谏官制度。君主为了约束官僚系统的行政权，也曾设立直属于皇帝的监察系统，通过监察权和行政权分设达到监督官僚系统的行政权的目的。唐朝时曾一度将制诰权（政令制定权）、封驳权（政令审查驳回权）和执行权分配给三个不同的机构而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从中国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政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总的趋势是权力日益集中于君主个人及其办事机构手中。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先生接受了分权制衡的理念，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思想，倡导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等五种治权分别由五院去实施，实行五权分离和相互制约，但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方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氛围比较浓厚，但1957年后毛泽东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将党内外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对待，破坏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氛围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形成了权力向各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集中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由于毛泽东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最终导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十年动乱”的悲剧。

1978年后，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权力高度集中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一把手腐败，逐渐认识到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实现分权制衡的重要性，并在权力的分离、分解和制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这种探索包括实行党政分开，也包括实行人事权、财权、物权的分属配置，更包括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就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强化分权制衡的努力提供了政策依据，开辟了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今后在保证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人大和政协对党委与政府的监督权，将成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一种可行的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分权制衡不是走西方三权分立的老路，而是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的新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 第七章 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

国际上有人一听到中国要建设文化强国，就本能地呈现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漫天飞的图景，就本能地和“中国威胁论”联系在一起。其实，强是相对弱而言的，中共所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没有表现出来，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可能将来有一天，连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都不复存在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文化发展还不能适应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还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改变，中共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首先是从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的，是以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自强为目的的，这从中共对建设文化强国相关目标的设定和部署上可以看出来。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有六条，中共十八大在文化建设强调了四个方面的要求。这些目标和要求如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第一，人要有理想、有信念、有道德，不能缺德少信，一切向钱看，只贪图物质享受，没有精神追求。第二，要不断出文化精品，现在文化产品很多，但泥沙俱下，垃圾也很多，如不改变，将极大影响人们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第三，公共文化服务要加强，改变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第四，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待提升。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占到整个GDP的25%，日本达到20%，而中国仅为2.5%。第五，中国文化产品的世界竞争力要进一步提高。根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发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介绍，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美国独占43%的比例，欧盟占34%，而中国不足4%。第六，要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第七，为保证文化为人民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要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由此可见，这些目标和要求丝毫没有威胁别人的意味在里面，所谓建设文化强国只不过是相比经济发展，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状态要逐步强起来；相比文化产业，文化事业要逐步强起来；相比美欧文化，中华文化要逐步强起来。把重点更多放到打造文化精品、丰富各阶层人们的精神生活上来，放到改革现有文化体制、鼓励和培养各类文化人才上来。

## 第七章 中国会搞“文化输出”吗？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所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是一回事，搞文化输出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客观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是挡也挡不住的，后者是一种战略选择，明摆着是去占领人家的文化市场的。国际社会尽可以放心，中国没有这样的战略。

从历史上看，中国虽然有 5000 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但中国人很少主动走出国门去传播自己的文化。因为中国历来秉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理念，即任何独特的美好与芬芳的事物总是能够自动吸引各方关注，无须言语和其他外力的推波助澜。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看，文化传播从来不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意图，而是“副产品”。唐代玄奘西游印度，意在取经；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为对外昭示“天朝恩泽”。中华文化之所以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主要是这些国家的人主动到中国来学习的结果；中国文化之所以对西方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一定影响，主要得益于西方传教士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是他们把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回到了欧洲。

然而，近代中国因鸦片战争而陷入衰败。这不仅打破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也打破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机时刻，中国人反省了自己的文化缺陷，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赶上西方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恰逢进入全球冷战时期，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基本上陷入意识形态的对抗战中，中国只能与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中国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此期间“左”的思想极其浓厚，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自身文化建设出现停滞，对外文化交流无从谈起。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现象最早在民间出现。1988 年，中国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文化产品首次获得国际奖项，激发了更多中国人将自创的代表其所思所想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此后，中国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中国应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观点，呼吁将富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在世界上逐步扩大中国影响力。这些学者在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全国政协作为中国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又将“文化走出去”理念提交到了中共中央。2011 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终明确将“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推动和落实。

中国为什么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首先，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还不相适应。中国需要妥善回应外部世界关切，需要更多地将语言和文化介绍给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状况，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观、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等等。其次，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通过文化走出去，与各国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老百姓可以从中了解自身文化所具有的优势与不足，进而增强文化自信。第三，“文化走出去”也是为迎接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挑战，加速调整经济结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遭遇严峻挑战，经济结构面临调整。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环保、节约资源、自主创新、带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目前，中国已有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区、文化强市的目标。第四，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有理由让中国的“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精髓走向世界，为消除文化冲突、构建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但是，中国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引起了西方一些人士的关注和议论，他们质疑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真实目的，担心中国会借“文化走出去”对外输出“中国模式”。这样的思维，主要是源于不了解当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主张。

首先，中国没有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冲动”。这在前面已经提到。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始终秉持“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实际、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的立场。十八大报告更把“发展模式多样化”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根本着眼点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多种模式竞相发展、优势互补，不仅是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源泉，也是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就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而受到尊重，也谈不上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其次，中国也没有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能力。数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在国际文化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掌握着国际话语权，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则在国际文化格局中长期处于“结构性弱势”的地位。试问，一个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的国家又如何能在全球输出自身的模式？！这一担心岂非杞人忧天？另外，西方影视书刊传媒等文化产品对中国民众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文化产品对西方民众的影响。

第三，中国愿与各国交流发展的经验。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新形势下，中国式崛起和复兴无疑引起了全球关注。如果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

感兴趣，并打算学习借鉴，中国当然愿意介绍交流，不会藏着掖着。中国始终相信，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取长补短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2011年，法国电力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马识路撰文指出：“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国也需要世界，以完善自身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相信中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也会对其他国家有所帮助，只要不抱偏见，相互学习借鉴总比自个儿摸索好，未雨绸缪总比雨后找伞强。

##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就业问题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民生问题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属于民生。但最主要的：一是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谈不上受教育、看病、住房等等。二是社会保障。没有了工作怎么办？挣的钱不够上医院怎么办？人老了以后怎么办？等等都是社会保障要解决的问题。三是分配公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相比之下，分配问题更具根本性和源头性。邓小平在1993年曾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前少。”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这三个方面的民生问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确实如此，就业是百姓自己最关心的事。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乱，欧洲重债国家连续爆发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伦敦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重要的诱因就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已经成为全球性、普遍性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与外国稍有不同的是，中国一方面面临就业难，一方面也面临招工难。从2010年开始，与每年几百万新增就业人口工作无着落相伴的，是用人单位招不到人的现象普遍出现。每年春节前后，不少地方曾经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变得冷冷清清。面对缺工困境，不仅东南沿海很多企业奔赴中西部地区上门“请工”，当地企业也纷纷开出优惠条件在家门口“留工”。这种纠结，反映了中国就业供需之间的根本矛盾：结构性不平衡。

什么叫结构性不平衡？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农村、从小跟随父母进城打工并在城市成长的青壮年劳动力。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0年发布的《新生代中国农民工研

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中国农民工总数的 60%，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 71% 的女性和 50% 的男性希望在城市买房定居。在就业上，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不同，是工资已经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在意是否开心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工厂化、大规模、重复化、流水线式的枯燥工作环境已经难以让他们满意。这种特征不仅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也是中国“80 后”、“90 后”的整体特征，特别是对于这一代大学生而言，他们虽然比农民工的选择余地更大，但就业难度也越来越突出。他们宁愿失业，也不愿到工厂里做装配工，他们需要的是工作环境好、体面光鲜的白领工作岗位。

而在供给方面，以往的就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工厂还是原来的样子，工作环境变化也不大，工作岗位大多还是蓝领的工作。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当第二产业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机会时，很多人会进入第三产业就业，因为第三产业除了餐饮、旅店、商业等传统领域，还包括金融、咨询、传媒、教育、物流等新兴领域，它提供的是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工作环境和社会评价比较高。但在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其延伸领域发展的程度还不够高，能够提供的个性化就业岗位总量并不大，有限的岗位往往也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不能在招聘上形成充分竞争。

此外，中国社会整体富裕程度的提升，也是就业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原因。二十几年前家庭收入少的时候，即便在城市，学生一毕业就要马上工作，不管工资多少，重要的是能够贴补家用。现在不同了，有的年轻人毕业后选择先玩两年，经济上“啃老”，等到有满意的工作再就业。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对于工作的态度已不完全取决于生计，而更注重个人感受、发展前景等精神因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面对就业问题上的新情况，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中国“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一论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数量上看，每个人都有份工作；二是从质量上看，每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高质量的就业”，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所达到的全社会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位相适、按劳付酬。为此，“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一是就业政策领航：在经济转型中拓展更多优质岗位。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初步建立了以《就业促进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稳定扩大就业的政策体系。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中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压力骤增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以最大化就业为保底政策，以优质化就业为最高目标，最大限度地处理好调结构与保

就业的关系，为不同就业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岗位。如：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必须一方面创造一定数量的高端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要保证淘汰岗位的稳妥分流，减少对就业负面影响。在培育新兴产业过程中，着力发展那些吸纳就业能力强，提供岗位质量高的产业。通过政府向社会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为大龄下岗人员、残疾登记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提供环保、绿化、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公益性岗位。

二是自主创业起航：就业天地宽广。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创业不仅可以实现自身就业，还具有带动他人就业的“倍增效应”。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自主创业，从中央政府《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到省市首批国家级创业城市创建活动的开展，从着手清理和消除阻碍创业的各种行业性、地区性壁垒，到完善和落实贷款、贴息、房租减免等鼓励创业的金融政策，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轻装上阵，开启梦想。新闻媒体还大力介绍创业典型，特别是那些面对失败不屈不挠成功实现再创业的典型，营造了崇尚创业、竞相创业、褒奖成功、宽容失败的和谐创业环境和良好舆论氛围，人们的创业意愿不断提升。

三是职业培训助航：让就业者赢在实力。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就业培训的重要性。在力度上，中国“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期间，政府用于就业培训的经费达到230亿元；在形式上，“订单式”培训等创新型劳务就业培训风生水起；在政策上，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

四是信息服务护航：求职之路更顺畅。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积极调动市场和社会资源，设立各种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积极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和政策咨询服务，开展个人职业素质测评，帮助劳动者了解岗位状况，更好地掌握求职方法。全国互联互通的就业信息网络建设也在不断兼容和优化过程中，就业信息越来越公开，就业机会越来越公平。

## 第八章 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社会利益大调整、社会结构大改组的过程，原有计划经济制度下社会保障模式的解体，必然迫切要求尽快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便为社会提供一个安全网。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间，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就更需要为公民构建一种防范和化解生存风险、维持基本生活的制度安排。否则，不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还会形成改革阻力。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全覆盖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入新世纪，中

共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创新性的社会保障理念，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最主要的：一是制度体系基本建立。2003 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 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 年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2010 年通过《社会保险法》……经过 20 年持续的公共服务制度建设，中国在养老、医疗、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社保制度逐渐走上了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的发展道路，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二是覆盖面不断扩大。到 2010 年，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已覆盖 12.6 亿城乡居民，使中国成为基本医疗保障覆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到 4.3 亿，比 2005 年增长 21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达到 8.3 亿，参保率 96%。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4 亿。

虽然中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不小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突出的有：一是公平性问题。2013 年 1 月，中国政府决定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养老金将接近 1900 元。至此，中国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了“九连增”。但这样的举措收获的不完全是掌声，相反，人们对于加快改变养老“双轨制”的呼声更强烈了。所谓养老“双轨制”，指的是 1991 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企业的养老保险筹资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责。于是从那时起，企业职工的“养老”被推向市场，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则仍由财政，也就是由纳税人埋单。在医疗方面也是如此，企业人员需要自己缴费参加医疗保险，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则可以享受公费医疗。

二是保障水平不均。这里既有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以及农民保障水平的差距，也有同一制度在不同统筹地区之间保障水平的差距。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待遇差别很大，有的相差十多倍；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因地方不同而有差别，差别也不小。还有一种影响劳动者自由流动的结构不公平，那就是统筹和接续政策的不匹配，养老金不能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比如在广东打工的河南农民工老张，为了养老，他要在打工地广东交钱参保，然而有一天如果他想回河南开厂子去了，由于广东和河南之间的社保不能统筹和接续，老张只能带走交的钱中的个人部分，企业交的那部分，就只能为广东“做贡献”了。

三是社会保障层次单一。早在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中就包括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但从中国目前制度建设的情况看，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同时，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以及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比较缓慢，多层次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并未成型。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一些突破性、创新性的理念，一是提出在坚持“全覆盖、保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二是强调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三是明确指出要“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这些理念若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更加强大、更加完善、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有人指出，过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有漏洞是因为中国穷、差钱，现在中国那么有钱，外汇储备丰厚，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老是强调“基本”保障呢？“不差钱”的政府建设一个高福利型的社会不就一劳永逸了吗？其实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与其国情相适应。中国的国情是：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仅有30多年的快速发展历史，且发展不平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在看上去有钱，可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几十年的积累如果都投入到福利中“分光吃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前功尽弃了。另一方面，欧债危机中所谓“福利国家”的入不敷出、叫苦不迭也让人触目惊心，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如果掉入这样的泥沼可能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 第九章 聚焦生态文明：无奈之举还是战略选择？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共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实际出发，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主动战略选择，反映了中国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必将在中国引起一场真正的革命。

“天人合一”是大势所趋。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在人类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与自然是分裂的，人把自然当作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不是视为有机的统一体。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对自然的攫取和破坏越来越严重，由此造成的对人类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确实如此，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伦敦成为一个被各种工厂包围的城市，烟尘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工业污染严重，集中体现了工业化高投入、高耗能、高消费的特征。有鉴于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1972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宣示，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长篇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先后问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逐步成为世界共识。现在，走遍欧洲，人们很难看到一寸不毛之地，整个欧洲就是一个被绿色包裹的大风景区。而中国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 37%，沙化土地面积占 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325 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超标比例为 11%，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如果中国未来仍面临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就是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又有什么意义？正是为了重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必须“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中国不再地大物博。“地大物博”这一概念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浪费资源和能源的“大手笔”也与这种观念有关。然而现实情况是，虽然中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能源、耕地、水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均国土面积 0.8 公顷，人均草地 0.33 公顷，人均森林面积 0.128 公顷，分别为世界人均值的 29%、50%、20%。人均耕地 0.095 公顷，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人均原油可采储量 2.6 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 1074 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 90 吨，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1%、4.3%、55.4%。在世界 144 个被排名统计的国家中，人均煤资源排在 50 位以后，淡水资源量排不进前 55 位，土地、耕地、森林等资源远远排在 100 位以后。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8.3%、4.1%、25.5%和 9.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占世界约 7%的耕地养活着约占世界 21%的人口，成绩的确不小，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上升到 56.7%，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也在快速上升。多年平均缺水量 536 亿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110 座城市严重缺水，中国七大水系中劣 5 类水体约占三成，已失去使用功能。一些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河湖萎缩、湿地减少、生态功能下降等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当地的生产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消耗强度高，自然资源消费供需矛盾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软肋。中共十八大报告把“节约资源”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原因就在这里，强调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目的也在这里。

“西方模式”无法复制。当代世界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无不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欧洲、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生震惊世界的系列

“环境公害事件”，其特点均为工业“三废”严重污染空气、水源、土壤和食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是对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提出的严峻挑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它们开始利用技术优势进行产业升级换代，而将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将“环境公害事件”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利用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快速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工业产业和环境污染的输出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取得瞩目的成就时，当初频繁出现在发达国家中的“环境公害事件”也开始逐渐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目前，由于各国的发展理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模式，将传统工业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尽量避免工业文明给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效果。

### 第九章 应对气候变化：真心还是假意？

近年来，中国积极地、建设性地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制定了自主的、明确的、强制性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大力推动节能减排，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碳汇，为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可以说，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乍看之下，中国一方面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又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求承担有区别的责任，似乎是自相矛盾。其实，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首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通行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规范，是国际环境法中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人类在反法西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抗击艾滋病、减少贫困等正义事业中取得的任何进步，无不是各国共同合作，责任按比例分担的结果。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各国都有责任采取实际行动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但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各国平均分摊责任。在环境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是通行的责任分担原则。它不仅适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而且体现在《人类环境宣言》、《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之中。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再次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向发展中国

家转让环境友好型技术和帮助加强能力建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2012 年 9 月 16 日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署 25 周年致辞中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成功经验表明,坚持以科学为依据的决策、审慎的做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代人和各代人之间的公平等基本原则,对所有国家都有益。

其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气候谈判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形成的共识,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自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已走过风云变幻的 20 年。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取得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德班平台”等重要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由于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很难想象,如果取消这条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会存在谈判与合作的基础。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原执行秘书伊福·德波尔所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基石,它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气候正义的内在要求。所谓“共同的责任”,意味着由于地球气候的整体性和导致全球变暖的复杂因素,各国无论大小、贫富、能力强弱,都对保护全球气候负有一份责任。所谓“有区别的责任”,意味着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这种共同责任的承担不是平均的,而应当有所区别;它是对共同责任的进一步细化和限定,是确保公平、正义、可行的必要基础。根据科学研究,当前的全球变暖是人类自工业化时代以来过多排放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结果。

从历史和现实看,发达国家应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据美国“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推算,从 1751 年到 2004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累计达到 11541.6 亿吨,其中的一半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排放的。据瑞士一家机构统计,从 1900 年到 2002 年,美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为 3030.34 亿吨,占同期世界累计排放量的 28.3%。同期,中国的排放量是 862.81 亿吨,只占世界的 8%。这意味着美国的累计排放量即所谓“存量”(stocks)是中国的 3.5 倍。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上升,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但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即所谓“流量”(flows)仍占世界总排放量的大部分。而且,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大量的转移排放。西方国家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和碳强度大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消费承担了大量的转移排放。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04 年中国出口商品蕴含的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6 亿吨,占中国排放总量的 34%,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三分之一是供外国人消费的。

从总量和人均看，尽管各国都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负有责任，但从人均水平来看各国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中国和美国为例，根据美国“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的数据，2004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0.07亿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7.28%，人均排放3.85吨。而美国的排放量是60.46亿吨，人均排放20.56吨。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5倍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已经过上富裕生活，但仍维持着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且大多属于消费型排放。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主要是生存型排放和国际转移排放。因此，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指出的，如果无视历史责任，无视人均排放和各国的发展水平，要求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应尽义务和能力范围的减排目标，是毫无道理的。

最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是根本之策。但是，在人类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必然要求控制一些高排放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控制一些用能领域的增长，必然要求更多的对低碳能源技术和低碳产业的投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低，技术落后，其产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处于低端位置。因此，对这些高排放产业和高用能领域的依赖性严重，同时又缺乏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和低碳产业的资金和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发展问题。目前，全世界还有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16亿人还没有用上电，而这些人口基本上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只有正视各国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客观现实，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才能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所说：“对于穷国来说，它们有一种发展的要务。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有变得更加富裕的权利，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对可持续性有着直接的意义。”因此他建议：“发达国家必须下决心大幅度削减其温室气体排放，从现在开始。发展中国家为追求增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其排放，但之后必须开始削减。两组国家将由此逐步会聚到一起。”

在当前情况下，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大幅度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而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根据各国国情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在这方面，中国尽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作出了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在历次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机制，坚持缔约方主导、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和协商一致的规则，加强与各方沟通交流，促进各方凝聚共识，为谈判不破裂、不偏离既定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中国作出了庄严的自主减排承诺，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学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中国政府这个承诺，直接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随后的历次谈判中，中国的积极作用依然得到各方赞赏。在2011年11月德班会议期间，美国《华盛顿邮报》13日发表文章说，当德班气候大会陷入僵局时，中国代表的积极表态使会议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也对中国的表现予以赞赏。她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道路上已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中国本着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切实努力，并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明确的中长期减排承诺，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中国首次把节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提出要在2005年基础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10%。在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9.06%，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14.29%，超额完成了预定减排任务；全国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3万平方公里，完成造林252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2001至2010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好于III类水质断面比例提高17.6个百分点，劣质V类水质断面比例降低14.9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指标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比例提高50.8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分别下降23.9%、9.7%、28.8%。从2012年开始，中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开展PM<sub>2.5</sub>监测并公布信息。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推进节能减排，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国际能源署2012年5月24日发表的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16亿吨，比上年增加了10亿吨。而中国2005年到2011年间的单位GDP排放量下降了15%。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的成绩，已经为全球环境提供了主要红利。

中国致力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向有关国家援助了自动气象观测站、

高空观测雷达站设施和森林保护设备；安排 2 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 3 年的国际合作，帮助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

总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尽的不同义务，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应当始终坚持。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决不能以延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继续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没有贫困和愚昧，没有歧视和压迫，没有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人为破坏，而是达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的平衡和谐”的“绿色繁荣的世界”，让现代文明成果惠及全人类、泽被子孙后代。

### 第三编 十八大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向何处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十八大政治报告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和当代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最初的中国离不开世界到如今的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从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到进入世界中心舞台，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到国际体系的建设者，从西方的学习者到发展经验的提供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吸引力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社会普遍关心，随着中国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特别是“中国梦”梦想成真，中国将在国际上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责任、扮演什么角色？中国与世界关系会不会因中国的发展变得紧张起来？对此，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八个字可谓道出了中国外交的真谛。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同十七大报告相比，中国外交的旗帜上多了“共赢”两个字。在中共看来，合作不是中国外交的终极目的，因为合作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也有情愿与勉强之别，若合作的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共赢，这样的合作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吗？中国把共赢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反映了对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的深化，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对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真实期待。

## 第十章 中国还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吗？

国际上有许多人在提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时，误以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可以让。实际上，和平发展首先应是安全的发展。这正如一个人，如果其连起码的生命安全都没有或整天病怏怏的，还谈什么事业前途？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其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每每处在威胁之中，怎么可能有发展？所以安全的发展是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军队、就要有国防。而且国家越发展，需要保护的利益也就越多，对军队和国防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了。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但中国的合理的想法总是被外界所误解，认为中国增加国防预算，加强军事和国防建设不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称霸。其实，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绝没有除此之外的其他非分之想。

首先，中国的国防投入始终保持合理适度的规模。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国土面积大，边境海岸线长，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国防投入方面一直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年度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仅为 1.4% 左右，而世界主要国家国防费占 GDP 的比重大都在 3%~4%。2012 年，中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仅为 1.3%，而美国、英国、印度等国的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在 2% 以上。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尽管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国外研究机构的数据称，中国军费在近 10 年内增长了两倍，是全球国防支出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但要强调的是，就绝对值而言仍远远低于美国。而且，看一个国家的国防费用高低，不仅要看绝对值，还要看相对值。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军费水平无论总量还是人均仍相当低，不会对外界构成什么威胁。

一直以来，中国注重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确定国防经费具体增幅时，始终遵循与综合国力的增长同步和相适应的合理原则。如在 2010 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防经费的增幅调整为 7.5%，2011 年随着国家经济面的逐步好转又恢复到 12.7%。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近年来国防经费的相对快速增长其实是对改革开放前期军队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一种补偿，是带有恢复性增长性质的。由于基础盘子小，即使增幅达两

位数，实际增量仍很有限。而且，中国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依据国防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对国防费进行管理，每年的国防费预算都纳入国家预算草案，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按规定程序下达执行，并接受国家和军队审计部门的监督，并不存在一些人炒作的所谓“隐性军费”问题。在军费开支方面，中国一直遵循两条原则，一是适度，绝不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绝不超出国力发展武器装备，不追高也不追规模。二是足够，至少要保证国防的最低需求，否则“国将不国”了。

其次，推进军事和国防现代化是履行新时期军队新职能的需要。着眼于积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努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之相适应，为提高完成上述任务的能力而逐年增加支出是合理和正常的。举例来说，近年来中国军队所承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越来越繁重。在国内，先后参与了汶川、玉树、雅安抗震救灾和甘肃舟曲泥石流抢险等重大行动。在对外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共参加 22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2 万余人次，有 9 名中国军人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牺牲。中国军队还先后 30 余次赴国外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任务。200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过往商船护航。截至目前，先后有 13 批护航编队参加护航任务，安全护送 474 批共 4727 艘中外船舶。

此外，当前世界军事变革不断加快，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必须“与时俱进”。为了进一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军事装备差距，近两年中国军队适当增加了高技术武器装备及其配套建设经费。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的步伐还会继续加速，对于合理增长国防费用、发展自己正当的国防力量，中国从未也无需遮遮掩掩。毕竟，中国只有真正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壮大制约“称霸”和“争霸”的力量，促进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的增长，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才能实现。

面对中国推进军事和国防建设的努力，国际上有些人在以种种借口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同时，屡屡指责中国军事和国防建设缺乏透明度。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一是一国的军事透明度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存在绝对的透明；二是所谓军事透明度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要达到更高的透明度，既取决于衡量标准、信息沟通等技术层面因素的不断改善，也取决于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军事战略意图透明度与政治互信程度直接相关。三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增加军事透明度。

1998 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发布了 8 部国防白皮书，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始终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 2011 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平等、互利、有

效的军事互信机制的基本目标等。2013年发表的首部专题型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次公布了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番号、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和海军人数、第二炮兵装备导弹型号等。为向世界更进一步传播中国国防政策，2008年5月18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首次亮相，自2011年4月起，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制度正式建立；2009年8月20日，国防部网站开始上线试运行，2011年8月1日，国防部网站在经过近两年稳定运行后于建军84周年之际正式开通。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近年来多次公开研发、测试尖端国防技术及装备。例如，2010年1月11日，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2011年初，成功首飞首款隐身战机歼-20；2011年8月首次成功进行首艘航母海试；2012年11月成功实现首款舰载歼击机歼-15着舰起降飞行；2013年1月，首次成功试飞第一架自主发展的大型运输机运-20；继2010年后，再次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这些尖端军事技术及装备的研制与测试，是与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安全战略相一致的。

从对外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从2007年起参加了旨在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全球机制《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每年向联合国报告军费开支情况，并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中国军队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如2011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了第二炮兵司令部。6个月后，美军参联会主席迈克尔·马伦访华，不但参观了二炮司令部，还登上了空军第三代战机，观摩了解放军某部反恐演习，实地参观了陆军机动合成指控系统和海军新型潜艇。中外军队联演联训也已成为中外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和常态化形式。这些新动向均凸显中国军事外交日趋开放、务实、活跃。上述不懈努力均突出表明，中国在提高军事透明度方面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更表明中国在提高军事透明度方面的诚意。

## 第十章 中国的和平发展有没有“原则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和平发展向来并非都是坦途，始终要准备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阻碍。既要在某些国家维系“霸权”和觊觎“霸权”的复杂斗争环境中坚持既定国策，也要处理好运用多种手段捍卫国家利益的现实问题。中国一贯倡导并践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主张用开放的心态看待和包容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别国价值观和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别国的核心关切，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当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时，中国也会坚持原则，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平等权利和正当权益。因为任何发展道路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不能认为中国会因走和平发展

道路而拿原则问题做交易。

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核心利益界定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六个方面。“六大核心利益”的明确提出，不仅给今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指明了方向，也向世界各国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不可妥协、不可让步和不容侵犯的最高原则，对维护国家安全、制定并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意义重大。也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以至强大后都不会谋霸，但这一切决不以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核心利益，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为代价。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有自己的原则要秉持，有自己的底线要坚守，绝不惧怕各种威慑和恐吓。

特别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此。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认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十八大报告还就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如：“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等。报告同时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由于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国际上有人质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其实，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状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基本方针和政策，是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主张两岸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可以并且应该通过和平方式寻求解决。两岸的中国人应当尽力避免骨肉同胞同室操戈、兵戎相见的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下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愿望，但凡事不能一厢情愿，倘若出现了“台独”的局面，就要采取坚决果敢措施，包括使用武力。这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可靠保障与最后手段，而且这主要是针对外国势力和分裂势力、“台独”势力的。倘若中国政府承诺不使用武力，“台独”分子有可能铤而走险，届时局面将更不好收拾。这也体现了中国“以战止战、以战求和”的传统哲学。

在实践中，大陆对台政策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2010年，两岸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对扩大两岸经

贸往来、密切两岸经贸联系、促进两岸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台湾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提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2012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把发展两岸关系专门列为一章。上述事实表明，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相信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在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两岸关系的发展前途，将台湾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除台湾问题外，近年来围绕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还存在争议，且相关摩擦和矛盾近来有数量增多、烈度上升之势。在此问题上，部分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中国立场强硬，不再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意味着不以战争手段谋求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害怕战争而不去捍卫国家利益。若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宣示为中国维护自身权益包括海洋权益的“紧箍咒”而肆意侵犯，显非明智之举，也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中国不会狂妄自大，但也决不会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时畏首畏尾。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共领导人也告诫军队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这并不是中国在用好战言论取代和平言论。历史已证明，如果想避免战争，就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战备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相反，战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争端，而不是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始终是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保卫国家利益的首选。

总之，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抱有善意，行为负责，尊重他国，谋求与各国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也不容肆意冒犯和欺侮的国家。经过60多年艰难曲折的探索，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国确实找到了建设国家、捍卫自身正当国家利益的巨大信心，相关立场也更加坚定，但这不是“傲慢”或“强硬”，而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并日益融入国际体系的大国的正常反应和表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是几代人前仆后继、胼手胝足的奋斗目标，也是今后几代人的光荣责任。中国不会因为外界的猜疑和曲解而动摇走经过自己慎重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 第十一章 中国的对外援助为什么不附加条件？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也曾慷慨援助过亚非拉很多国家。根据2011年《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对外援助60余年来，援外金额累计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000多个成套项目，80%左右的对外援助给予了亚洲和非洲。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指导思想，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 1955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是中国援外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理论渊源。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 14 国时首次提出了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为核心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尤其是政治条件成为中国外援的基本指导原则，也为此后历届中国政府所坚持。2009 年 11 月，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时又一次郑重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和援助，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始终坚持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地位平等，是朋友和伙伴的关系，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南南合作的关系，不是单向赠与的关系。

然而，有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表示不赞同甚至指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与西方在对外援助的理念与方式上存在差异性和竞争性，导致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误解和担忧加深。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对受援国的人权、民主、良政等问题愈益重视，要求援助资金促进受援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在实际操作中，西方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以便通过援助影响和改变受援国的发展进程与方向。西方国家并不把附加政治条件贬义化，反而认为附加政治条件有助于对援助资金的使用进行规范和引导，对援助过程进行监控，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外援助的目标。但中国把附加政治条件等同于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不接受别国将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中国，也绝不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为许多原本依赖西方援助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使其中一些国家可以拒绝西方国家附加了大量政治条件的援助，从而弱化了西方传统上通过援助对这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力。同时，随着中国迅速成为新兴援助大国，西方国家将中国援助视为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秩序的冲击。

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批评和指责，其中一些源于对中西不同援助理念的不了解，但也有一些是别有用心无端指责。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外援是为了更方便地获取受援国的能源、占领受援国的市场。事实上，非洲出口到中国的石油不到 30%。2009 年，中国在非直接投资中，矿业投资约占 29%，而美国直接投资中的矿业投资占到 60%。中国还帮助资源比较贫乏的马里援建大桥、修路。又如，有人批评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是纵容受援国政府的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实际上，在援助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共同全程参与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对援助过程实施监督。而且中国对外援助一般都是以实物形式或工程项目建设方式提供，尽量避免提供现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腐败可能

引发的各种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并不是漠视受援国的人道主义问题，相反，正是基于重视人权，中国政府才从有助于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方面加强援助，通过援助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如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路、桥梁、铁路、电站、船坞、港口、机场、邮电通讯设施等，切实帮助受援国提高生活水平和加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的这一做法得到受援国的普遍欢迎。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指出：“通过各种公平合理的合同，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了数百万非洲民众的生活水平。比起西方批评者，中国人更有竞争力，较少官僚作风，更适合非洲。”世界银行2008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也指出：“中国在非洲承建了大量桥梁、公路和铁路。这些项目大多集中在自然条件艰苦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础设施改善极大推动了非洲经济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

相比之下，西方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实际上是束缚了受援国的手脚，发挥的作用有限。以非洲为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试图通过附加条件推动非洲政策变化的结构性贷款，在改变非洲政策方面并不成功。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援助所附加的大量政治条件及其所推行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使非洲国家的腐败率下降。相反，许多非洲国家首脑为了获得西方援助，不得不在言行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直接缩小了其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贸易和产业政策等诸多领域的调控空间，降低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此外，附加政治条件的潜台词就是援助国比受援国更清楚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和方式。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不仅不符合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准则，也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定律，招致了受援国政府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博茨瓦纳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等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曾要求西方停止对非洲国家决策过程的干预，不要根据西方的意愿决定非洲的发展方向。

## 第十一章 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吗？

按照英国牛津词典和韦氏词典的解释，新殖民主义是指强国通过施加经济或政治压力来控制或影响其他国家。多年来，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不对非洲进行控制、干涉或掠夺。在政治上，中国与非洲是平等互信的关系；在军事上，中国在非洲没有建立军事基地或派驻军队；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截止目前，中国对非援助项目达900多个，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达4万多名。2012年，中非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中非人员往来超过150万人次。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即踏上非洲热土，足见中国珍视中非传

统友谊。访问期间共签署 40 多个合作文件，包含一批有利于非洲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非援助、投融资合作、职业人才培养等；强调中方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鼓励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事实证明，中国是在帮助非洲而非殖民非洲。

第一，中国对非洲的投资结构良好。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下，非洲虽有自然资源比较优势，但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虽然随着非洲国家的相继独立而收回了资源的所有权，但在数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国有企业重新私有化。由于本国资本实力有限，主要行业重新落在西方资本手中。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反观中国的对非投资，虽然当前中国对非投资的占比仍很小，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为 162.5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 3.8%，占非洲吸收外资存量的 2.9%，但中国的大量资本投入到资源之外的行业。截至 2012 年 6 月，中国对非各类投资 450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金融业和建筑业投资占 60%，采矿业投资约占 25%。绝大部分投资有利于促进非洲产业链与基础设施发展。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企业在非洲开采品位最差的资源、雇用最缺乏劳动技能的工人、从事最艰苦的行业。并不是中国企业甘于处在行业底层，而是中国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社会底层的改善来实现。西方国家对非投资经历了数百年，为非洲带来了少数富裕的行业和高端人群，但非洲国家的贫富界限日益分明。非洲缺乏的是真正能把底层非洲人民带向富裕的外来投资，而中国企业的投资填补了这一空缺。中国企业积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改善当地投资和生活环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帮助东道国建设交通网线、通讯设施、城市给排水以及学校医院等，改善了当地的投资和生活环境。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0 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房建竣工面积约 7000 万平米，修建道路约 6 万公里，电站装机容量约 350 万千瓦。中石油在非洲地区积极帮助所在地修建学校，提供基础教育设施，仅在苏丹就累计捐建学校 35 所，为 7 万多名适龄儿童提供上学机会。

第二，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在快速增长。在与非洲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采取促进非洲产品进口的政策。从 2009 年起，中国跃居并持续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此后三年，非洲对中国出口翻了一番。非洲出口中国的商品种类日益丰富，既包括非洲农产品，又包括钢材、铜材、化肥等工业制成品。同时，为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在 2012 年还推出了更多的激励政策，如实施“对非贸易专项计划”，派出赴非投资贸易促进团，扩大非洲产品进口；支持举办更多的非洲商品展，为非洲企业推介优势商品提供便利；进一步对非洲国家开放市场，提高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享受零关税待遇的出口商品税目的比重。在这些政策激励下，非洲产品在中国获得更

广阔的市场。考虑到非洲大多数国家并不富裕，中国向非出口的价格较为低廉的商品也有助于非洲普通大众的生活改善。

第三，中国始终致力于解决非洲的粮食问题。中国政府多次表示，要把农业和粮食安全作为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长期以来，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农业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合作。通过扩大贸易、投资、援助、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中国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和加工能力；通过增加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技术组，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渡过粮食危机。在《北京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5年）》中，中国政府又明确宣布了一系列中非农业合作计划，未来中国对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努力还将持续下去。

第四，中国对非洲人权高度重视。中国一贯认为，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非洲亟需解决的正是生存与发展问题。因此，中国更多地将对非援助内容集中于基本生存条件与发展条件的协同提高上，对非援助向民生发展、减贫扶贫、防灾减灾和能力建设方面倾斜，为非洲新建了学校、医院、路桥、供水项目；派遣了大批医疗队员，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员近4万名，向非洲国家提供2万多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为建设和发展非洲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总之，中国与非洲的经济交往是建立在传统友谊基础上的互利共赢的交往，所谓“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是完全立不住脚的。在这方面，非洲国家领导人最有发言权。在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访问非洲三国时，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表示，中国尊重非洲，帮助非洲，不干涉非洲内政；有人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这是别有用心；非洲人民经历过殖民主义，知道什么是殖民主义，绝不会被这种论调误导；非洲人民支持非中合作，希望中国在促进非洲和平、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对有人刻意炒作所谓“新殖民主义”表示愤慨，称“这是荒谬、毫无根据的指责，非洲对中国怀有信心和信任。中国真诚希望非洲取得发展”！乍得总统代比再三告诉习主席，非洲朋友非常欢迎中国人，也欢迎中国企业。中国对非洲的贡献也越来越得到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的认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称，一度因为猜疑而受到损害的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转让技术，并向当地经济注入资金。在那些曾经对亚洲巨人感到害怕的小国，这种变化尤其明显。CNN报道称，中国10年里在加纳建造的基础设施，比英国100年建的还多。美利坚大学教授、著名的中非关系研究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其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中指出，中国带给非洲的是真真切切能够推动非洲发展的贸易和投资项目。

## 第十二章 中美会发生全面对抗吗？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的中国和美国，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种关系到底怎么相处颇让两国领导人“伤脑筋”，太近，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似不太可能；太远，也会因同样的原因怕引起误解、误判。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议，双方应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共主张，不但中美之间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也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的大国关系而言的。纵观世界历史，有太多大国争霸祸及自身、殃及世界的惨痛教训。从十四、十五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到美苏冷战对峙，大国关系都没能摆脱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的“历史宿命”。一个国家的兴起，势必要挤压到原先“守成大国”的利益，于是“守成大国”总是想尽办法打压、封杀新兴大国。这一攻一守的矛盾的解决途径几乎都离不开战争。以战争奠定秩序，以战争改变秩序，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铁律。基于这样的铁律思维，不少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势必引起新的冲突。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就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时，针对中国的“狼来了”的呼声就更加急促。

中共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基于对传统大国关系教训的汲取，更是基于对当今时代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观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增多，任何国家都不能凭一己之力实现发展，也不可能单独化解矛盾和挑战，世界正在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各国只有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才是处理相互关系的正确之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等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建立不结盟、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各方基于现实利益的共同选择，也是时代的强烈呼唤。

那么中共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应是什么样子的呢？对这个问题，十八大报告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12个字，“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持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而在这三者之中，包容互鉴又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试金石作用。做不到包容互鉴，平等互信只是口惠，没有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恐难实至。只有坚持包容互鉴才能消除矛盾冲突的思想根源、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也才能搭建起新型大国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纵观人类历史，许多矛盾冲突与文化、文明、宗教、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有关。二战发动的背后有“种族优越论”作祟，意识形态是战后几十年美苏对抗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宗教在巴以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世人皆知，冷战后美国开启的几场战争更多与其在全球推行的民主化战略有关。凡此种种都说明，一种文化或价值观对另一种文化或价值观的排斥、拒绝甚至视之为仇敌，是造成这个世界不稳定、不安全的重要根源。凭心而论，每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没有哪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是绝对善或绝对恶的，如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哲学，这个世界将不得安宁。我们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主张不扛社会制度的旗，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均是因为这些思想违背了包容互鉴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既不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也不利于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如果美国能对中国的制度包容一些，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借鉴一些，中美之间的问题会少很多，美国也可能会早一点走出金融危机。

## 第十二章 中国开始“远交近攻”了吗？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陆地边界 22,000 多公里，海岸线 18,000 多公里，周边国家数量多达 29 个，其中直接接壤的邻国 14 个。远亲不如近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新世纪以来，中国更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周边。2002 年，中共十六大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确定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方针。之后，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2011 年 4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共建“和谐亚洲”的倡议，得到亚洲各国的广泛支持。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

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正是在这些方针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稳步发展，双边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上和睦相处、经济上互利互惠、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互学互鉴，不仅促进了各自的发展、繁荣和进步，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也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应该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是与中国采取的这种方针政策分不开的。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中国政府采取的是自保的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就可能不会有今天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国际社会的目光可能不会更多投向亚洲。

不可否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不是没有矛盾和分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同一些国家存在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周边个别国家在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甚至动用军舰和警力非法袭扰中国渔民、拘捕中国公民，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党和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得已采取相应措施，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在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中持强硬立场，是恢复到历史上的“远交近攻”传统。这种说法实在有失公允。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和明确的，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尽管相关国家一再采取挑衅措施和不友好态度，中国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坚持从发展双边友好关系大局出发，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谈判和双边外交协商妥善解决双方分歧，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着正常的沟通，同时坚决反对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介入。可以说，中国在处理与个别周边国家的分歧时是“有理”的，但中国并没有因为自己“得理”就“不饶人”。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关系时，要保持谦虚谨慎，不能傲慢，但谦虚谨慎也不等于容忍他国欺负，大小国家都要相互尊重，大国不能轻视和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

中国处理与邻国分歧上的政策不仅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态度，也反映了中国对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珍惜。今后，中国将继续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求大同存小异，照顾彼此安全关切，最大限度地展现善意、智慧、耐心，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积极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把握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努力让中国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周边，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

